行业协会共同追思刘杲同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馨宇/整理

12月10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版权协会、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图书评论学会、韬奋基金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中国编辑学会联合主办，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承办的刘杲同志追思会在京举行。

会上，相关行业协会负责人进行追思发言，深切缅怀刘杲同志。本报特辟专版编发，以寄哀思。

新闻出版界学习的典范

■孙寿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

刘杲同志是一位政治上极为清醒睿智的领导者。他始终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引领新闻出版事业沿着党和国家指引的道路稳步前行。他深刻理解新闻出版工作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意义，将党的方针政策精准地贯彻到每一项工作决策与实践中，为行业构筑起坚实的政治基石。

他是一位业务上极为专业、精湛的领导者。他为我国《出版管理条例》的制定，对著作权、版权管理事业做了许多具有基础性、奠基性的工作。他对出版业务的精通涵盖了从选题策划到编辑校对，从印刷发行到市场运营的各个环节。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行业经验，为众多出版物的品质提升把关定向。他总是能精准把握时代脉搏，前瞻性地洞察行业发展趋势，提出具有建设性和开创性的理念与举措。在他的影响下，众多出版单位找准定位，为行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动力。

他是一位充满奉献精神的领导者。他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新闻出版事业。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他埋头于文件资料之中，为制定行业政策法规绞尽脑汁；他深入基层出版单位，了解实际困难，为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他活跃于国内外出版交流舞台，为推动中国新闻出版走向世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不懈努力。他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智慧，为行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业务骨干和领军人才，用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奉献精神在行业内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他是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领导者。他为人正直，胸怀坦荡，始终坚守道德底线和职业操守，以清正廉洁的形象赢得了广大同仁的敬重与信任。他对待同事和蔼可亲，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和建议，营造了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他关心弱势群体，积极倡导公益出版事业，致力于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文化发展的成果。他的高尚品格，成为我们为人处世、从业立身的光辉典范。

他是新闻出版界学习的楷模，他的政治清醒、业务精湛、奉献精神和高尚品格，将激励我们为推动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而不懈奋斗。

出版人心中的楷模

■邬书林（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我们深切怀念、敬重刘杲同志，是因为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知识、智慧和辛劳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出版事业，并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刘杲同志从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他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是这段时间中有关出版的重要文件、重要法律法规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是重要出版工作、重大出版工程的参与者和领导者。

我们深切怀念、敬重刘杲同志，是因为他关心同志，关心青年的成长，用榜样的力量影响了一代出版人，成为大家心中的楷模。

我讲一讲，从我入职、工作期间到退休时的三件事。

1982年，我入职不久，工作中我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篇关于印刷业和各个国家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的报告，从宏观上论述了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我把这份资料整理成简报上报后，受到了许力以、宋木文和刘杲同志的关注，许力以、刘杲同志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时任《出版工作》主编的方厚枢同志，并发表了此文。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说，在中央机关工作，首先要学会让研究成果为机关的工作服务，然后在行业中产生影响促进工作。要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工作要求，与出版工作的实际、出版规律的考量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工作。现在回想，入职不久便能得到这些“高人”的指点，学会工作方法，这是何等的幸运！对我今后的工作和成长是何等之重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我开始分管发行工作，在书业发行的一次会上，我谈了对发行工作的想法，报纸刊发后，受到了刘杲同志的关注，他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既充分肯定了我的许多想法，又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2014年我从新闻出版广电管理岗位上退下后，去拜访刘杲同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说退休之后是大好时光，可以选择既对党和国家有利、受出版界欢迎，又力所能及的工作，继续发挥余热。这是我退休10多年来还能保持工作意愿，既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又身心愉快的原因。

我们深切怀念、敬重刘杲同志，是因为他热爱生活，清正廉洁，公私分明，关爱家人。

刘杲同志个人修为堪称典范。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作风正派是一个公务员最基本的要求，看似平常，其实在当下的环境中要做到十分不易。在这方面刘杲同志对自己的要求可谓十分苛刻。

刘杲同志退出工作岗位之后本可以贡献更多的才华与智慧，但老伴得病后，他亲自护理长达10多年，无怨无悔，照顾之精心、护理之认真一直在朋友圈里成为美谈，令人感佩。

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思想敏锐、工作勤奋、清正廉洁、能力卓越、温情宽厚、贡献良多的长者形象，他是公务员的楷模。

学习传承他的出版理念

■吴尚之（中国期刊协会理事长）

刘杲同志关于出版的论述，具有远见卓识。他提出的出版观点，阐释的出版理念，更加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于文化建设和出版工作的认识和思考，对我们做好新时代的出版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中，刘杲同志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论述和观点有这样四个方面令人思考，印象深刻。

一是提出编辑活动要以人为本。刘杲同志在《我们是中国编辑》一书的《自序》中提出的编辑活动要以人为本的观点和论述，诠释了出版工作的宗旨，体现了出版工作的初心。编辑出版工作是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只有尊重作者的权利，才能更好地保护作者的创新精神，才能有更多的优秀作品问世。只有尊重受众的权利，竭诚为受众服务，弘扬韬奋精神，才能赢得读者的支持，实现出版的价值。

二是提出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刘杲同志阐释了编辑出版工作的目标与追求，体现了文化繁荣与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如何衡量和评价文化繁荣和出版发展？归根到底，要看是否能创作出版一批传世之作，这是衡量文化繁荣和出版发展的重要标志。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出版载体和形式如何变化，出版最基本的功能和要求没有变，就是要传播和积累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提供优质的出版内容、有价值的阅读产品。

三是提出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刘杲同志阐明了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出版产业的两重性，既有经济的要求，更有文化的要求。正确处理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明确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就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出版产业发展的方向，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更好地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四是提出要大力培养优秀编辑人才。刘杲同志十分重视编辑人才的培养。他在多篇文章中阐明了编辑人才的基本要求、出版情怀和文化担当，提倡做学者型编辑，指出编辑人才的培养途径。刘杲同志关于编辑人才的观点和论述，很有前瞻性、针对性和现实性，对加强我国出版人才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对刘杲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要弘扬他的崇高精神，学习他的高尚品格，传承他的出版理念，以推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出版事业。

为推进发行体制改革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艾立民（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

我代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深切缅怀刘杲同志为行业协会建设和我国出版发行事业的繁荣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刘杲同志是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的会长，为发行协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91年3月6日，在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副署长刘杲等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刘杲同志当选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对协会的职能定位、工作导向和服务宗旨提出明确的要求。他从加强协会的组织建设、制定行规行约、举办发行人员培训班、开展评比先进和表彰先进活动等几个方面对协会工作进行了部署。在这届的4年任期中，刘杲同志团结带领协会理事会及领导班子开始了发行协会的全面建设。

1995年4月19日，刘杲同志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会长。第二届的任期内，自1997年开始，将首都图书交易会与中国发协举办的订货会合并，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统一冠名“北京图书订货会”，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行业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图书交易活动。

刘杲同志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担任会长的9年，倾情奉献，事必躬亲，为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刘杲同志作为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领导，在推进发行体制改革发展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我国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是从流通领域破题的。刘杲同志是“一主三多一少”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

刘杲积极推动中国发协集个体书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1992年，身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协会会长的刘杲出席该工委会成立会并讲话。

1996年，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后，刘杲同志深入中央部委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系统调研，并召开会议就贯彻落实文件精神作出部署。

刘杲先后撰写《迎接新世纪》《图书发行的神圣职责》《坚定不移地走向市场》等多篇重要文章，深入推进发行体制改革。

我们缅怀刘杲同志为我国出版发行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学习他的高尚品格、精神风范和事业情怀，继续推进协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印香墨韵中的远见卓识

■刘晓凯（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

刘杲同志的逝世，是中国出版、编辑、版权界的巨大损失，同样也是印刷业的巨大损失。

刘老非常重视印刷工作。曾在全国书刊印刷工作座谈会和生产调度会上指出，出版事业有多重要，书刊印刷就有多重要。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进行书刊印刷的改革，提高出版物的印制质量，缩短出版物的印制周期，增强短版活、多版次印制服务能力。并在1992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要抓好书刊、报纸的印刷技术改造工作。制定书刊印刷行业技术改造规划，抓好印刷专项改造项目的实施，搞好书刊印刷技改重点项目的技术、设备引进计划和组织实施。

现在回想起来，刘老的指导堪称高瞻远瞩。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印刷业从1978年的总产值50亿元、图书品种2万种，发展到如今的总产值1.44万亿元，印制图书54.03万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整体发展路径基本和刘老指引的方向一致，特别是近年来，以印数少、批量多、交货快为特点的短版印刷服务需求大量涌现，让人不得不佩服刘老的远见卓识。

28年前，刘老出席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对中国印协和中国印刷业提出四点殷切希望：一是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加快印刷技术的进步，攀登世界高峰。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印刷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三是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养一大批向世界先进水平进军的印刷技术人才。四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如今，我国印刷业产业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我国自主生产的印刷设备在德国德鲁巴国际大展上大放异彩，展商数量全球第一，展出面积全球第二，部分设备主要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印协设立的毕印刷技术奖，38年来共评选出211位优秀创新人才和7项重要科技成果，成为我国印刷行业重要的科学技术奖项。中国印协创办的中国国际全印展，已成功举办了9届，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型国际印刷设备及技术展览会之一。

希望这些成绩能够告慰刘老的在天之灵。我们广大印刷工作者，将用好刘老的智慧经验，学好刘老的精神品格，把他奉献一生的出版印刷事业继续推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我在版权领域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

■阎晓宏（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

我和刘老的工作交往，是在版权领域。2004年，我从图书司到版权局任副局长，和刘老的交往多了起来。

刘老是新中国版权事业的领导者、奠基人，他是著作权法起草小组组长、出版法起草小组组长，真正是一位专家型的领导。刘杲同志对上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对下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非常包容和豁达。

上世纪80年代，国务院讨论成立国家出版局，认为没有必要再成立国家版权局了，刘杲同志在会上阐述了出版和版权的区别，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认同，成立国家出版局，加挂了国家版权局的牌子，这种模式一直延续着。

其实版权的范围比出版、新闻出版和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覆盖的范围还要宽。基于这种认识，刘杲同志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经有过提案，建议成立知识产权总署，涵盖专利、商标和版权。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刘杲同志之间有过坦率的交流。我认为，版权主要覆盖文化领域，而专利、商标主要覆盖工业和商业，《伯尔尼公约》全称就是《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而专利和商标被称为工业产权，对应的国际条约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条约》。而且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版权和专利、商标分属不同的机构，在欧洲除了英国专利商标、版权机构是合一的，其他国家都是分离的。

刘杲同志认为，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看，以前知识产权包括版权作用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从发展看，知识产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关于版权产业的提法，我刚到版权局时，在工作报告中延续了版权产业的提法，但刘杲同志不赞同。他说，如果版权称版权产业，那专利就可以称专利产业，商标就可以称商标产业，这个提法不严谨。我觉得刘杲讲得有道理，因此在工作报告中，将版权产业的提法，改为版权相关产业。

后来，由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我国开展版权产业调研，我们现在使用版权产业和版权相关产业两个概念。但是使用版权产业这个概念，必须明确它并不代表行业，而仅是为了说明版权在相关产业、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

刘老关于版权的思想和观点，涵盖在他的《著作权工作笔记》一书之中，我也是这本书的最早读者。刘老去世后我又重读一遍，最深刻的感受是，他对著作权的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表达著作权的思想观点保持着一致性。

刘老是我国著作权制度的奠基者领导者，也是我在版权领域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刘老的精神永存，刘老活在我们心中。

与时俱进、温润如玉的前辈

■郭义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

我代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也作为出版界的后辈，向刘杲同志的逝世表示深深哀悼，永远缅怀他。我1983年进入中宣部，1986年开始，因服务一位分管出版工作的领导，同出版工作有了联系，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比较频繁地与刘杲同志电话联系。后来知道刘杲同志曾担任过中宣部办公室的副主任，一下对他便多了几分亲近感。从宣传部系统讲，刘杲同志也是我的老领导、老前辈。

与刘杲同志最早直接接触是在1986年，我随领导去广西南宁参加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在南宁会议期间，一天上午，我和一位一同参会的同事看会上没啥事，就想到街上去买点给家人的东西。本来是去去就回，结果因接我们的车没按时到，又联系不上（那时没手机），眼看到了饭点，我们赶紧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给宾馆，告知我们的行踪。一回宾馆，我服务的领导非常不高兴，说了不少指责的话，一时气氛有点凝重和压抑。这时刘杲同志说，不是多大的事，批评两句就行了，年轻人，哪有不出错的。这件事不大，却让我对刘杲同志满怀感激。那时我20多岁，如今刘杲同志已经去了，我也已跨入退休行列，但这件事我始终难忘。

后来在刘杲同志已届高龄某一天，他突然亲自打电话给我，挺着急地说，小郭呀，你老领导家里没人接电话呀，打了几次，怎么回事呀，没问题吧？我赶紧向刘杲同志报告，目前两人都接不了电话，情况还好，您别惦记。他对曾经一起工作的同志，心中始终挂念。

还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在一次中宣部的培训班上，刘杲同志专门做了一次关于出版指导方针拨乱反正的报告，他思路之清晰、观点之深刻，给我以深刻教育。

在图书审读方面，他也对我教育甚深。有一次他说，审书有诀窍的，不见得一页一页地从头看到尾，要找重点，一本书容易出错在什么地方，只要发现有一两处硬伤，就不用再看了。当然我知道，能准确把握一本书内容的重点，谈何容易，需要渊博的知识和长期的积累。

从我对刘杲同志的认识，我感到刘杲同志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是一个实干家、办事能力很强的人，是一个能跟上时代步伐、坚持与时俱进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极富智慧、处理复杂问题能够举重若轻的人，是一个能出色把握原则性与灵活分寸的人，是一个有想法、肚子里有东西的人，是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人，是一个让接触他的人都感到如沐春风、温润如玉的人。出版作为文化行业，能够涌现出我直接有接触的像许力以、宋木文、刘杲同志这样专家型、学者型的，充满浓厚人情味和强烈文化情怀的人，符合我们出版的特点，也始终是值得我们自豪与骄傲的。

出版“高人”，习静如山

■刘伯根（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刘署长站位高、水平高、品格高，是出版界的“高人”。

站位高。本世纪初，出版界一下子成立了许多家出版集团，要“造大船”。刘署长对此是鼓励支持的，同时又有自己冷静的思考。出版集团与一般的企业集团有什么区别呢？他说，企业集团靠兼并重组迅速发展，可是出版企业之间的兼并由于政策的限制，目前还是很难的；企业集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出版企业集团是否也能这样做？我国的出版集团、出版社在几十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刘署长多有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刻，对我们当年研究思考中国出版集团的改革发展，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至今仍对出版界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水平高。他实际主持制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出版法规和政策文件；他的著作和文章，思虑深刻且观点鲜明；他的讲话，从不照本宣科，既缜密又好懂；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凡是接触他的无不交口称赞；他的贡献，从出版管理到制定政策法规，从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到规范国内市场、“扫黄打非”，从出版单位建设、出版学科建设到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人才培养，涉及到出版工作的方方面面，至今仍有启迪和借鉴价值。

品格高。我们都知道刘署长十几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病老伴的例子。怎样对待亲人，是怎样对待同志的最好镜子。1998年，在第三届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奖颁奖大会的间隙，刘署长对我说，你的报奖材料中，《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编辑体例》看起来像是一本小书，我是认真看了的，看得出你是下功夫编书的人。这是刘署长第一次与我对话，他的话，让我大为感动、备受鼓舞。那一届的获奖编辑有76人，参评而未获奖的编辑还有很多。这么多人，这么多材料，刘署长不仅都看了，还能记得住细节。刘署长的肯定和鼓励，体现了出版界老领导对于青年编辑的关怀之深、爱护之切、扶持之力，使我终生难忘。

与刘署长接触多的人，叹服他；接触少或者只是读过他著作、听过他讲话的人，敬佩他；了解当代出版史的人，也都对他高山仰止。贤者虚怀若谷，仁人习静如山。刘署长，出版“高人”也；高人者，风范永存！

（发言内容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